

African Socialism; or, the Search for an Indigenous Mod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xcerpt II)

By Emmanuel Akyeampong
Translated by ZHANG Xiaoyuan

Received: July 7, 2023

Accepted: July 20, 2023

Published: December 31, 2023

To cite this article: Emmanuel Akyeampong, trans. ZHANG Xiaoyuan. (2023). African Socialism; or, the Search for an Indigenous Mod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xcerpt II.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3(4), 103–109, DOI: [10.53789/j.1653-0465.2023.0304.012](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3.0304.012)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3.0304.012>

Abstract: This article primarily discusses the perspectives of foreign scholars on African socialism. Ralph Austin, in *African Economic History* (1987), pointed out that few African countries explicitly chose capitalism upon gaining independence. For those countries that did choose capitalism, it became a default or residual mode. “African socialism” was popular in the initial decades following Ghana’s independence and was pursued by several countries, including Ghana, Guinea, Senegal, and Tanzania. Based on this premise, the article explores African socialism as a generation’s exploration of an indigenous model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generation held contradictory views towards capitalism but approached alignment with the communist camp during the Cold War with caution. Importantly, advocates of African socialism often presented bold and transformative visions for their countries. However, these visions may be worth reconsidering as they do not conform to the socialist model.

Keywords: African socialism; political independe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Sourc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conomic History of Developing Regions*, Volume 33, Issue 1, 2018.

Notes on the author: Emmanuel Akyeampong is a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of African and African American Studies and the Oppenheimer Faculty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African Studies at Harvard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West African history, Islam in sub-Saharan Africa, disease and medicine, ecology, African diasporas, and political economy and trade.

Notes on the translator: ZHANG Xiaoyuan is a graduate student studying MTI (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at Jishou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lie i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非洲社會主義

——經濟發展本土模式何以可能？

(節選二)

埃馬紐埃爾·阿基揚龐/文 張校源/譯

摘要:「非洲社會主義」在加納獨立後的最初幾十年很流行,包括加納、幾內亞、塞內加爾和坦桑尼亞在內的諸多國家也紛紛尋求該思想的指導。拉爾夫·奧斯汀曾在《非洲經濟史》(1987年)中指出,很少有非洲國家在獨立時明確選擇資本主義,對於那些選擇資本主義的國家來說,資本主義是一種默認模式或剩餘模式。背景下,本文探討了一代人將非洲社會主義視為探索本土經濟發展模式的事實,說明這一代人既對資本主義持矛盾態度,又對在冷戰時期被置於共產主義陣營的謹慎態度。重要的是,非洲社會主義的宣導者經常為他們的國家提出大膽和變革的願景。而這些願景可能值得重新審視,因為它並不符合社會主義模式。

關鍵詞:非洲社會主義;政治獨立;經濟發展

來源:原文原載於《發展中地區經濟史》(*Economic History of Developing Regions*)2018年第33卷第1期。

作者簡介:埃馬紐埃爾·阿基揚龐(Emmanuel Akyeampong),系歷史、非洲和非裔美國人研究教授,也是哈佛大學非洲研究中心的艾倫格尼教授。研究重點是西非歷史、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伊斯蘭教、疾病和醫學、生態學、非洲僑民、政治經濟和貿易。

譯者簡介:張校源,吉首大學MTI碩士在讀,研究方向為翻譯理論與實踐。

一、拯救非洲社會主義

值得慶倖的是,四位政治家都將自己對於新國家的哲學理念和願景記錄在案。他們對非洲社會主義的哲學思考有著一些不謀而合之處。他們都認為自己的意識形態立場是國家建設的核心,而意識形態教育,既是團結新的多民族國家之關鍵,也是將愛國主義灌輸給國民的必由之路。他們認為:「解放自己國家」與「將整個大陸從殖民統治中解放出來」這樣更大範圍的運動之間是彼此聯繫的。他們都強調復興非洲舊文化價值觀的同時,讓其適應當今世界。他們都重視經濟上的自力更生和不結盟原則恩克魯瑪(Nkrumah)、桑戈爾(Léopold Sédar Senghor)和尼雷爾(Nyerere)在歐洲、美國留學時接觸過左派意識形態,而塞庫·圖雷(Sékou Touré)作為一名工會主義者崛起了,他因僅持有一張學歷證書而被西非泛非政黨非洲民主聯盟(RDA)知識份子所看低。(Schmidt 2007: 129)。事實上,直到國家的年輕激進分子(特別是那些在法國受過教育的人)敦促他朝著這個方向前進,塞庫·圖雷本人似乎沒有向左的計畫。直到1958年7月,他都沒有推動獨立運動,而是一直在推進修憲。(Schmidt 2007: 144)

塞庫·圖雷在其關於文化革命的書中,概述了幾內亞民主黨所持的信念、願景和計畫。他指出,文化革

命(Cultural Revolution)是一種將改良社會置於個人利益之上的社會主義觀點。他說,殖民主義是一種文化侵略行為:

所有形式的帝國主義都是一種伴隨著文化侵略、文化適應、文化異化的行動,目的是將被殖民地的本土文化完全顛覆,也是為了達到政治征服和經濟征服必不可少的運動。正因如此,對於擺脫了殖民奴役的民族來說,為鞏固民族獨立和實質主權,有一件事是勢在必行的——完成文化去異化任務。如是,方可重拾民族文化,並在各領域中充分體現民意。(Sekou Touré 1972: 117)

對塞庫·圖恩來說,這並不是回歸到某種浪漫的過去。他認為文化是動態的,並強調了幾內亞人民理性的非觀,故而反對桑戈爾的「黑人意識」他認為非洲在情感和精神層面上對世界文化做出了貢獻,而歐洲的貢獻則是基於其批判性思維。(Sekou Touré 1972: 130-131)。桑戈爾尋求非洲與法國文化的某種結合,這種想法對於一個娶了法國女人的非洲男人來說是可以理解的。塞庫·圖雷與其不同,他甚至主張復興非洲語言。如果將法國在柯那克里投了反對票後從幾內亞撤軍這一事件納入考慮範圍,那麼這種立場也是可以理解的。

另一方面,桑戈爾是博學的。他畢業于索邦大學,同時也是第一位獲得法國最高教師文憑的非洲黑人。這種博學在他的傑作《論非洲社會主義》(「*On African Socialism*」)一書中展現得淋漓盡致。在非洲人認識到法國工人和資產階級是殖民統治的受益者、殖民主義和階級鬥爭並不必然一致之後,他反思了1948年塞內加爾民族主義者和法國社會黨分道揚鑣的原因,他宣稱:

我們不是今天所說的「馬克思主義者」,因為馬克思主義是作為一種無神論的形而上學、一種總體性和極權主義的世界觀呈現的。馬克思自己也曾說過:「於我本人而言,我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我們是社會主義者。換言之,我們需要學習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他們的作品著手,就像從「空想社會主義者」的作品開始學習一樣。我們應該把他們的追隨者和評論家的作品也一併納入學習範圍之中。但我們只能學其方法與思路——方法,用來分析形勢;思路,用來解決問題。

桑戈爾(1964: 26)

桑戈爾正確指出,馬克思是一位關心經濟學的哲學家,因為他對歐洲工人階級的現狀抱有興趣。同時他準確地指出:「我們絕不能把馬克思看作像凱恩斯那樣的經濟學家,而應將其視為社會學家、哲學家」。他進一步闡明:「我們不是共產黨員」,並給出了相關的理論依據和現實依據。而且為了防止西方認為他們會轉變態度,他表示:

然而,我們不會被一個字面上的資本主義和自由企業的政權所征服。我們不能對種族隔離視而不見,儘管聯邦政府反對種族隔離,我們也不能接受以物質豐富為導向的生活方式。

他宣稱:「我們代表一個中間路線——民主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融合了精神價值觀,是一種與法國



社會主義者的舊道德潮流相關的社會主義」(Senghor 1964: 46)。

我們兩位英語世界的高學歷者恩克魯瑪和尼雷爾,伊薩·希福吉(2010:123)認為,後者並不是一位理論家,指出「他將村莊發展理論變成一條新的發展道路,實際是不可行的」。尼雷爾只想看到坦桑尼亞人民生活水準提高,而讓他感到不安的是,工人、企業家和農民的財富積累。希福吉(2010: 132)還說:

姆瓦利姆·尼雷爾(Mwalimu Nyerere)的思想並沒有抓住他對鄉村的主要聚焦點——政治經濟方面^⑥。我敢說,這是因為尼雷爾和恩克魯瑪不一樣,前者對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理解並不透徹。眾所周知,「建設社會主義是階級鬥爭的過程」在他心中從未被認可。因此他不承認自己領導的國家具有階級性。他相信,只要一個國家的領導者秉持無私和堅定的原則,那他心中堅信的改革就能在這個國家推行。尼雷爾天真地認為,如果能夠阻止坦桑尼亞城鄉的財富積累,他就可以避免階級的形成以及隨之而來的階級鬥爭——這種階級鬥爭曾將歐洲社會撕得粉碎。

在此方面,比起對非洲歷史的瞭解,尼雷爾對歐洲歷史更是洞若觀火。因為他概述了在歐洲創造資本主義的歷史進程,並且闡釋了為何非洲有著不同的社會主義的根基:

歐洲社會主義誕生於土地革命和緊隨其後的工業革命。前者造就了社會中的「有地」階級與「無地」階級;後者產生了現代資本家和工業無產階級。這兩次革命在社會內部播下了衝突的種子,但其使徒們卻將這種衝突神化為一種哲學。(Nyerere 1968: 11)

相反,他說,非洲社會主義的根基在於家族(被稱為「烏賈馬」或「家庭制」)詮釋了我們的社會主義。他說,非洲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和教條社會主義,前者以人對人的剝削為基礎,後者則基於人與人之間不可避免的衝突。恩克魯瑪相信辯證法,以及辯證法如何揭示非殖民化和發展的進程,但他不是無神論者。他是一位懂經濟學的哲學家,而他於1964年7月出版的著作《良知主義》則是闡述他走近非洲社會主義道路背後的哲學的主要著作^⑦。以下是他對「良知主義」的闡釋:

因此,社會革命的背後必須有一場思想革命作為堅實後盾,一場我們의思想和哲學統統以社會救贖為導向的革命。我們的哲學必須從我們所處的環境和生存條件入手,並且必須吸收更多知識性內容。非洲大陸的解放就是人類的解放。這需要明確兩個目標:第一,恢復平權主義。第二,為恢復平權主義不惜調動一切資源。

必須站在這場社會革命背後作為有力支撐的哲學,就是我曾提到過的哲學良知主義;良知主義是關於軍隊配置的知識性地圖,它將讓非洲社會有能力消化存於非洲的西方元素、伊斯蘭元素和歐洲基督教元素,並囊括以上要素,以契合非洲特色的路徑統合發展。非洲特性本身是由非洲傳統社會所依據的一系列人文主義原則所界定的。哲學良知主義的基礎是唯物主義,它是一種哲學立場,它從非洲良知的現實內容出發,指明了從非洲良知的衝突中鍛造進步的方式。(Nkrumah 1970 (1964): 78-79)。

恩克魯瑪的追隨者中,真正理解其哲學的不多。隨著時間推移,他的哲學被稱為了「恩克魯瑪主義」。恩克魯瑪政府總統事務部長科菲·巴科(Kofi Baako)給「恩克魯瑪主義」下了更為簡潔的定義:「以非洲現狀為藍本的非無神論的科學社會主義」。美國中情局(CIA)對恩克魯瑪的意識形態定位不屑一顧,並表示:「儘管他對適應非洲環境的社會主義學說有著強烈的親和力,但他自己的設計才是其主要關注點。」^⑧

在簡要概述了我們四位領導人的非洲社會主義原則核心內容之後,我現在來談談他們的經濟在非洲社會主義下的表現。他們都制定了經濟控制制度,所以國家的經濟狀況由國家決定,而不由市場決定。在非洲社會主義制度下,這四個國家的經濟狀況都很糟糕。恩克魯瑪是1966年2月通過軍事政變被驅逐的四位領導人之一。但到1961年,迦納經濟已經陷入困境,正如中情局備忘錄所解釋的那樣:

恩克魯瑪的麻煩因其遇到的經濟困難而加劇。世界可哥價格處在多年來的底部,可哥農進一步被刺激,這要歸咎於行銷委員把資金分配給了一般經濟發展計畫,而並沒有用於緩解他們的特殊困難。此外,即使是更廣泛的經濟計畫也不奏效——在獨立後的四年裡,政府因不明智的發展計畫和優先政府建築的商討,浪費了2.5億英鎊的財政遺產。目前的跡象表明,迦納財政儲備將於1962年耗盡,恩克魯瑪政府將迫切需要國外的預算支援和現有發展專案的財政援助。^⑨

儘管他宣導社會主義,並從1960年開始便向東方陣營傾斜,但不像他的埃及朋友賈邁勒·阿卜杜勒·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他並沒有將外資企業國有化,後者1961年時將593家企業國有化,以重塑埃及的經濟。(Asamoah 2014: 73)。恩克魯瑪所做的是利用東方集團國家,通過建立國有企業來擴大迦納經濟。1962年,迦納《每日寫真報》刊登了一份憲報公告:

在1961年與外國政府簽訂的63項協定中:有44項是與東歐國家進行貿易、支付以及科學、技術和文化方面的合作;與中國和南斯拉夫分別簽訂5項;1項是與美國簽訂的關於美國和平隊的運作。(Asamoah 2014: 77)。

政府統計學家奧馬博(E. N. Omaboe)在1966年的一項研究中指出:恩克魯瑪政府雖然對公共部門和國有企業進行了大量投資,但未曾擲地有聲。其與東方集團的貿易規模也很小——1963年迦納只有11%的進口來自該集團,流向該集團的出口量只占到總出口的13.7%(奧馬博1966: 29-31)。最新的一項研究指出,迦納國有企業表現十分糟糕,到1966年,迦納約有52家國有企業,另有25家工業和製造業企業。從1957年獨立到1966年恩克魯瑪被政府推翻,迦納的外匯儲備急劇惡化,從2.69億美元降至負3.91億美元。總之,到恩克魯瑪被推翻之前,迦納已經破產了(Aryeetey & Fosu 2008: 297)。

儘管塞古·杜爾(Ahmed Sékou Touré, 1922-1984)在1984年去世之前一直擔任幾內亞總統,但1958年與迦納建立聯盟的幾內亞情況並沒有好轉。幾內亞在恩克魯瑪被推翻後為其提供了庇護,塞古·杜爾任命恩克魯瑪為共同總統。幾內亞獨立後的經濟以香蕉種植園和黃金、鑽石、鋁礬土、鐵礦石的開採為基。1961年甘迺迪總統就任後,不顧法國總統戴高樂的抗議,批准了對幾內亞的援助計畫:



雙方同意,幾內亞將在柯那克里河上修建一座大壩,該大壩可為輕工業提供電力;為幾內亞英語教學計畫提供專業人才;為幾內亞提供糧食援助,為幾內亞參與工業和政府的行政、技術人員提供培訓;並向派出一支和平隊特遣隊。(Muehlenbeck 2012: 63)

塞古·杜爾欣然接受了這一提議。他證明了自己不是一個理論家:在古巴導彈危機期間,應甘迺迪要求,他拒絕了俄羅斯在幾內亞飛往古巴的途中為他們的飛機加油。在這個獨立初期(直到1963年底)幾內亞的經濟都是政府在進行軟控制,而隨著國家計畫取代市場(Doumbouya & Camara 2008: 591),政策隨之轉變為硬控制。1963年甘迺迪遇刺事件是否影響了這一轉變,則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在得知甘迺迪去世的消息後,塞古·杜爾哀歎道:「我失去了我在外界唯一的真朋友」(Muehlenbeck 2012: 227)。從1964年到1984年,幾內亞轉向社會主義經濟。國家開始銷售農產品,農民則被要求將一部分農產品送到國營商店,而國家還制定了出廠價。1982年,幾內亞經濟陷入危機,成為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託管國,並通過了一項結構調整方案(Doumbouya & Camara 2008: 591-597)。

在桑戈爾領導下,塞內加爾的經濟也舉步維艱,國家採取了保護主義政策,以保護1960年獨立後無法進入法屬西非聯邦市場的製造業公司的利益。在殖民統治下,塞內加爾的工業部門似乎無法擺脫殖民經濟的結構。作為資源稀缺國家,塞內加爾的主要資產是其在法國殖民統治下通過聯邦資本的身份繼承下來的機構。20世紀60年代起,薩赫勒地區的乾旱和不斷增加的乾旱破壞了塞內加爾堅果產業的生存能力。塞內加爾的人均收入在1960年到2000年間以每年2.9%的速度增長,人口增長率則為3%。Ndiaye(2008: 403)總結了1980年12月31日卸任總統的桑戈爾領導下的經濟政策和結果:

研究塞內加爾1960年到1993年的增長記錄揭示了其政策選擇上的糟糕——特別是「軟控制綜合症」和不可持續支出的插曲——造成了嚴重的市場控制、惡劣的投資環境、龐雜而低效的政府部門、嚴重的貿易保護和不可持續的債務戰略。更糟糕的是不利的氣候條件,特別是乾旱。同時,該國經濟表現也因其在全球主要出口產品的出口量下跌,而受到嚴重影響。

政府不僅干預製造業,還依靠農業部門的租金來承保公務員數量的劇增,塞內加爾公務員數量從1965年的3.49萬增加到1973年的6.1萬。桑戈爾承諾與法國資本合作、承諾外國企業在塞內加爾不被國有化。塞內加爾作為非洲金融共同體法郎區成員國以及其與法國的親密關係保證了它獲得外部資金,並保證這些資金不貶值。直到1994年,法國將非洲金融共同體法郎貶值50%。

坦桑尼亞經歷了獨立非洲歷史上的重大經濟轉型之一,政府的「村莊化行動」在4~5年內迫使900萬農民搬遷到發展村。農民對集體生產不感興趣,政府就採取了強制措施。到1975年,約70%的坦桑尼亞人已經搬遷。1967年的《阿魯沙宣言》中,政府宣佈了將工業國有化的意向。1977年尼雷爾對坦桑尼亞經濟進行評估時,坦誠地承認:在農業和工業方面,坦桑尼亞經濟都做得很差。他承認:「事實是,農業的結果非常令人失望」,「我們幾乎所有工廠的運行都遠遠低於其產能;有時,現有機器所能生產的產品中,只有不到50%是實際生產並投向市場的。經濟學家姆瓦斯和恩杜魯(Mwase & Ndulu 2008: 427)揭示了這一慘痛失敗的原因:

政府制定政策時的平等主義色彩導致了經濟激勵服從於政治目標。20 世紀 70 年代和 80 年代初的經濟政策,其目的在於「為人際、區域間和城鄉層面實現公平提供支援」這一政治目標。

到 20 世紀 70 年代末,「烏賈馬」被遺棄。當農民的勞動得不到回報,也就失去了努力的動力。

令人震驚的是,與恩克魯瑪領導下的迦納不同,坦桑尼亞在尼雷爾執政期間接受了大量的捐助,而恩克魯瑪的社會主義政策則受到了西方捐助界的嚴懲。我認為,國際捐助界可以看到坦桑尼亞確實是在尋求一種本土經濟模式,儘管他們可能不同意尼雷爾的政策,但他們尊重尼雷爾的努力、誠意和正直。Mwase & Ndulu(2008: 432)評論道:

非常引人注目的是,即便是在坦桑尼亞發展的「硬控制」階段,其也得到了發展夥伴的大力支持,援助和官方信貸的大量流入證明了這一點。儘管坦桑尼亞政府宣佈非洲社會主義是政府決策之基,但在 1967 年到 1977 年間,無論是絕對數量還是相對於其他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國家)而言,援助的流入都顯著增加。姆瓦利姆·尼雷爾擔任總統的「社會主義」眼光激起了資本主義西方學術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廣泛讚賞和支持。

同時,這也反映了尼雷爾真誠正直,他決定下臺,承認他的政策失敗,並表示應當探索其他路徑了。他到老都是一個值得尊敬的人物,是坦桑尼亞的一股清流。

(Editors: Bonnie WANG & Joe ZHANG)